

宁皿对照,“该皿也是扁球形,肩部有垂耳的环耳,只是口上有直颈,圈足也是直壁的”,据肩上铭文“廿七年,宁为钺(皿)”,皿当作于魏安厘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50年)。^①而此年与李先生推断的“十年”为桓惠王十年(公元前263年),相距不远。廿七年宁皿目前学界一般据其纪年及形制、字体定为魏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年),这应当是对的。宁皿铭文字体整饬狭长,与战国中期魏惠王时所铸的梁十九年鼎、廿七年大梁司寇鼎、卅年虬令鼎、卅五年虬令鼎等如出一

辙,与河北平山中山王三器铭文字体也有相通之处。^②在战国早期魏国曾占领中山,魏国的文字风格显然对中山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③中山三器下葬的年代在公元前308年或公元前307年,这个年代与上引魏惠王诸器相距不远。安邑下官钟这种类型的容器在战国中晚期也是比较盛行的。中山王墓所出中山王圆壶及多件左使库壶、右使库壶皆与安邑下官钟形制接近。从钟、皿的形制来看,将较量铭文中的“十年九月”前移至韩厘王十年也是合适的。

Additional Remarks on Anyi Xiaguan Zhong and Shangguan Min

ZHOU Bo

(Research Institute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Pal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recently released inscriptions of Anyi Xiaguan Zhong (vase from Anyi) unearthed in Xianyang Taerpo and Shangguan Min (jar from Yingyang) relate to the official and measurement system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se inscrip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Li Xueqin's article in 2003 mad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two organs, and solved many important problems. But in the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other aspects still need further discussion. This paper made some new textual criticisms and explanations on the inscriptions, and discussed again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official, measurement system and the recorded age of inscriptions.

Key words: Anyi Xiaguan zhong; Shangguan min; Warring States scripts; bronze inscriptions

[责任编辑 陈文彬]

南宋三省与临安的城市空间

朱 溢

(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 上海 200433)

【摘要】对南宋政权来说,在临安城内嵌入各种朝廷衙署,是使这座城市从地方都会变为政治中心的必要条件之一,不过临安有限的城市规模、既有的空间格局对此制约甚大。在帝制时代历代王朝的都城中,临安的面积偏小,城外的地理条件也使临安城在空间上难以拓展。就政治形势而言,南宋长期处于外部的军事压力下,无法对临安进行大规模重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作为朝廷核心机构的三省,其衙署的创设也不免遇到困难,故而在地理位置和空间分布上极具特色。由于宫城位于临安城南端,三省只好在宫城北安置。宫城附近可利用空间有限,造成三省在临安无法整体植入,除主体部分靠近宫城外,六部架阁库、文思院、军器所、礼部贡院、别试所等下属机构不得不散置于临安的其他地块。三省与临安的日常生活空间之间存在紧张关系:附近云集的店铺和住宅,导致三省主体部分的安保条件欠佳、火情危险不断;其他下属机构也是面临复杂的周围环境,这使其日常管理、职能发挥颇受影响。另一方面,这些机构的植入,是临安的都城机能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临安的空间结构、都市景观。正是都城机能与城市空间的不断调适,使临安成为帝制时代颇为独特的一个都城。

【关键词】南宋 三省 临安 城市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在南宋史研究中,临安向来不乏关注。除了不可避免地论及南宋政权定都临安的经过、原因外,学者们主要围绕临安的城区规划、经济发展、文化艺术、市民生活等方面展开研究。也就是说,现有的研究成果偏重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探讨,繁荣的商品经济、丰富的城市生活更是研究的重中之重。这无论在谢和耐(Jacques Gernet)《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等综合性专著的内容安排及其权重中,还是在各类专题性著作、论文的数量和比例中,都能得到印证。

相形之下,临安的政治属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

固然在临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但是在其他城市并非没有反映,只是程度上存在差异而已。在南宋,临安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根本不同在于其都城机能。在帝制时代,都城既是国家权力中枢所在,也象征着皇权统治的神圣性、正统性。作为都城机能的指标性构成要素,皇宫、朝廷衙署、礼制建筑、禁军驻地的研究,对我们周全地理解南宋临安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南宋临安的皇宫、朝廷衙署、礼制建筑、禁军驻地在过去的论著中虽然有所提及,但是介绍明显多过分析,研究深度不足。近些年,这种状况逐渐得到了改善,其中高桥弘臣的研究最值得关注。他先是撰文探讨了绍兴年间南宋如何将临安改造成都城,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宫殿和祭祀设施,二是官厅和财政设施,三是治安和防火体制;再将研究聚焦于禁军的驻屯,

[作者简介] 朱 溢,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教授。

①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宋史研究中心课题“南宋临安的都城机能与城市空间”(15JDN01YB)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李学勤:《东周上官皿与安邑下官钟》,《文物》2003年第10期。

② 参黄盛璋:《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问题》,《古文字研究》第1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页;李学勤:《论梁十九年鼎及有关青铜器》,其著:《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07~208页。

③ 参董珊:《读珍秦斋藏吴越三晋铭文札记》,萧春源编:《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澳门:澳门基金会,2006年,第292页。

检讨其对临安城市景观、庶民文化的影响;又以南宋初年国家祭祀的整顿为主题,将其置于第二次绍兴和议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随后在考察临安城内外诸地块的历史变迁时,对皇宫、朝廷衙署、礼制建筑、禁军驻地的设置、变动都有关注。^①高桥弘臣的系列研究成绩卓著,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对临安都城机能的认识。若论其不足的话,主要是未能对都城机能与临安的空间特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予以充分的重视。

在历代王朝的都城中,临安的面积偏小,与唐朝的长安、北宋的东京相比都是如此。^②而且,东面的钱塘江、西面的西湖、南面的山丘、北面的沼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临安的空间扩展。就政治形势而言,南宋长期处于金朝的军事压力下,也难以对临安进行大规模重建。在这个空间规模有限的城市中,都城机能如何实现,是在过去的研究中未曾涉及的问题。其中,朝廷衙署在临安的植入及其产生的影响,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为此本文拟以三省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朝廷核心机构如何在临安得到安置,其空间特质如何影响国家的日常政治、临安的城市生活。

二、三省主体部分的安置及其与周围环境的互动

(一) 三省主体部分的地理位置

在《乾道临安志》和《咸淳临安志》中,三省的地点一致,只是表述略有不同:根据前者记载,“在和宁门外之北”;^③根据后者记载,“在和宁门北旧显宁

寺”。^④事实上,三省在临安的地点没有变过,一直在显宁寺的基址上。

在绍兴八年(1138)二月长驻临安前,宋高宗多次以此地为行在所,时间分别为建炎三年(1129)二月至四月、绍兴二年正月至四年十月、绍兴五年二月至六年九月。高宗初来此地时,就将尚书省建在显宁寺,但是机构运行的效果不容乐观:“〔建炎三年二月〕十三日至杭州,上以府衙作行宫,以显宁寺充尚书省。百司官吏到者曾无十之一,如三省六房公吏本千余人,得至者其数不满五十,所以行在在职务久而不备。”^⑤

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驻蹕于绍兴府的高宗“诏以会稽漕运不继,移蹕临安,命两浙转运副使徐康国兼权临安府,与内侍杨公弼先营公室”。^⑥随后,三省表示:“徐康国权知临安府,措置移蹕事务,令具到行在百司局所。”对此,高宗“诏宜措置,随宜辍截,不得骚扰,仍具已辍截处所画图申尚书省”。^⑦通过次月君臣对谏院安置事项的商议,可知三省在临安的地点已有定夺。当时,身为右司谏的方孟卿声称:“祖宗故事,谏官置局于后省,号为两省官。盖两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以谏官居之,不无深意。今行在谏院,许于皇城内建置,未有定处。望令依旧随省置局。”^⑧于是,高宗“诏谏院许于行在所都堂相近置局”。^⑨《宋史·职官志》对此事也有记载:“中兴初,诏谏院不隶两省。绍兴二年,诏并依旧赴三省元置局处。”^⑩结合这两则史料不难确认,在方孟卿上奏前,

朝廷就确定将三省置于宫城外“三省元置局处”,也就是在显宁寺的基址上,谏院则拟安置于宫城内。为此,方孟卿要求按照“随省置局”的惯例改置谏院,并得到了高宗的认可。

绍兴二年(1131)正月高宗抵达临安后,朝廷衙署陆续植入,这方面记载不多,造成这些机构的安置细节不易掌握。作为朝廷的核心部门,三省也不例外,与此有关的史料只能找到一条:绍兴二年二月,高宗“诏六部于东北角开便门,遇有职事赴都堂禀白,听于便门出入”。^①通过这条史料可以捕捉到两点重要信息,一是三省、六部已经初步得到安置,二是六部虽然隶属于尚书省,但是三省、六部各有独立的正门,彼此之间有便门相通。虽然没有直接的文献记载,但是考虑到高宗此次驻蹕临安的时间将近三年,我们倾向于认为,包括三省在内的朝廷机构当是在这段时间完成了办公设施的修建,绍兴八年南宋政权长驻临安后,只需沿用旧有的衙署即可。

放眼整个帝制时代,南宋三省在都城中的分布状况、空间位置颇为特殊。在大多数朝代,大内位于都城的中心或北部,朝廷核心机构多被置于大内以南不远处,有的甚至在大内办公,这既是及时处理国家政治事务的需要,也是为了方便皇帝将其意志通过这些机构层层传递下去。三省的地点在唐朝、北宋都是如此安排的。在唐朝长安,中书外省、门下外省、尚书省位于皇城内,中书省、门下省建在太极宫内。^②大明宫成为唐朝皇帝的主要居所后,其内也建立了中书省和门下省。^③北宋的政治体制在元丰改制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起初不掌握实权的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成为行政中枢,办公地点随之调整。焦洋对北宋中书省、门下省的方位变动有准确梳理:中书省在北宋初年至明道元年(1032)七月位于宫城南门宣德门外西

面北廊,明道元年七月迁至右掖门以西;门下省在北宋初年至治平二年三月间位于左掖门外西面北廊;治平二年(1065)三月中书省与门下省互换位置;元丰改制后,中书省、门下省一同迁入大内文德殿西南的旧中书门下东厅,此外还建立了中书后省、门下后省,将其置于中书省、门下省的北面。^④尚书省的地理位置则始终在宫城外:“省旧在兴国坊。太平兴国中移于利仁坊。祥符四年八月重修,晁迥撰记。天禧四年十一月八日复修。元丰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诏尚书省寓治旧三司。”^⑤

南宋政权并未仿效唐朝、北宋的先例,在宫城南建立尚书省,在宫城内安置中书省、门下省,而是将三省和枢密院纳入同一院落,地点则在宫城以北。之所以采取这一不同寻常的做法,既有受制于临安地理条件的成分,又有官制演进的因素。

宫城位于临安南端,因此绝大多数的朝廷衙署都不可避免地分布在宫城以北。不过,除了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也都在宫城之外,恐怕与宫城的规模、地形有一定关系。2004年,临江城考古队对南宋宫城进行了勘探调查,探明其形状为不规则长方形,东西、南北直线距离最长处分别约800米、600米。^⑥可见南宋宫城规模不大,更何况其中还有不少难以充分开发利用的山坡。^⑦宫城内安置宫殿后,所余空间非常有限。于是,一些原先在北宋位于宫城内的机构移至宫城外,阁门司、客省、四方馆的迁出就是例子。根据《乾道临安志》的记载,阁门司、四方馆、客省皆在和宁门外。^⑧《咸淳临安志》对客省、四方馆地点的记载更为具体,即东华门北。^⑨这三个机构合称横行三司,赵冬梅对其在北宋时期的职责作了归纳:客省在外事接待之外,也代表皇帝向臣下颁赐酒食;四方馆负责节庆表章的通进、重大

① 高桥弘臣:《南宋の国都臨安の建設——紹興年間を中心として》,收入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の長江流域——社会経済史の視点から》,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第173~209页;《南宋臨安における禁軍の駐屯とその影響》,《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人文科学編》第27号,2009年,第75~107页;《南宋の皇帝祭祀と臨安》,《東洋史研究》第69卷第4号,2011年,第611~643页;《南宋臨安における空間形態とその変遷》,《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人文科学編》第33号,2012年,第1~40页。

② 经过考古发掘,已经探明唐代长安的外郭城东西广9721米,南北长8651.7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第596页)。北宋东京的外城呈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东墙基约7660米,西墙基约7590米,南墙基约6990米,北墙基约6940米(开封宋城考古队:《北宋东京外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文物》1992年第12期,第52~53页)。南宋临安遗址南北长约14里,东西宽约5里(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③ 《乾道临安志》卷一《三省》,收入《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215页。

④ 《咸淳临安志》卷四《朝省》,收入《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379页。

⑤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85页。

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九绍兴元年十一月戊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71页。

⑦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之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286页。

⑧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〇绍兴元年十二月甲申条,第890页。在北宋的元丰改制中,原本建制独立的谏院遭到废黜,谏官分别归于门下省、中书省,到了南宋初年,谏院恢复了独立建制:“诏谏院别置局,不隶后省,许与两省官相见议事。元丰初,用唐制,置谏官八员,分左右隶两省。至是始复之,如祖宗之故。”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五建炎三年七月辛卯条,第511~512页。从后来衙署在临安的空间安排看,谏院与两省也是“同门而异户”(《咸淳临安志》卷四《朝省》,第3395页)。

⑨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786页。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一绍兴二年二月丙戌条,第910页。

② 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唐皇城》,收入《长安志·长安志图》,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248~251页;卷六《官室四》,第233页。

③ 《长安志》卷六《官室四》,第240页。

④ 焦洋:《北宋东京皇城、官城的“名”与“实”》,《南方建筑》2011年第4期。

⑤ 王应麟:《玉海》卷一之二《元丰尚书省》,南京、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第2243页。

⑥ 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第24页。

⑦ 张劲在实地探查后指出,临安官城按照地形自西向东大致可以分为凤凰山东麓、凤凰山与馒头山所夹的山谷平地、馒头山及其以东的平地三部分,其中西部地势较高,官城内的建筑主要分布在地形较为平缓的中部和东部,不过即便是中部和东部,也没有一整块规模较大的平地,而是多为坡度不同的台地。参见张劲:《两宋开封临安皇城官苑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90~92页。

⑧ 《乾道临安志》卷一《内诸司》,第3218页。

⑨ 《咸淳临安志》卷一〇《阁职》,第3440页。

礼仪场合服饰位次的安排;閤门司的业务最为繁重,涉及朝会班次的安排、百官奏疏的通进、诏敕告身的送达。^①在北宋,横行三司皆位于禁中;四方馆在朝堂门外,閤门司在紫宸殿前南廊,客省在閤门司之西。^②它们的职能在南宋并未发生大的变化:閤门司“掌朝参、朝贺、上殿、到班、上官等仪范。有知閤、簿书、宣赞,及閤门祇候、寄班等官”,客省“掌接收节建奉香及贺表,外国使人往来接伴之礼”,四方馆“掌接收诸州府郡朔望正冬贺表,及大礼贺表等事”。^③在南宋,横行三司依然是联系皇帝与外部世界的重要桥梁,特别是閤门司承担的排班、引见职责直接发生在宫城内,之所以都被撵出禁中,最合理的解释便是宫城规模、地形条件的制约。

中书省、门下省位于宫城之外,除了有可能像横行三司那样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外,官僚机构变动的因素也不能排除。南宋初年,三省在人事安排、机构运作上有所调整,史书中可看到“三省合一”的说法。^④对此学者们有不同解释:朱瑞熙认为,此举并非要取消各自的机构,而是三省长官一起商讨军国大事,共同向皇帝奏报;^⑤贾玉英将其理解为三省长官职能的合一;^⑥张祜指出,南宋初年主要是确立了一套三省长官彼此互兼的制度,在实际政务运作中,三省的分工依然存在。^⑦这些看法虽有差异,但是南宋三省之间的界限较之以前确实明显淡化,加上临安宫城内空间有限,三省被安置在同一院落也就不难理解了。

枢密院和三省设在一处,除了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外,也与机构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在北宋,枢密院虽然有过搬迁,但是始终位于宫城内。^⑧南宋

政权建立后,枢密院的作用趋于弱化。梁天锡指出,从建炎四年(1130)六月开始,宰相兼知枢密院事,侵夺了枢密院的职权,枢密院在此之后沦为“宰相属府”。^⑨枢密院与三省被置于同一院落,正是枢密院依附于三省的直观反映。绍兴三年(1133)二月,三省、枢密院在上奏时,就提到了“缘旧制,三省、枢密院各班奏事,各厅治事。今宰相兼知枢密院,系同班奏事、同堂治事”的现状。^⑩虽然在此之后一度恢复过三省和枢密院官员分班奏事的制度,但是时间并不算长,而有效实行的时间更短。^⑪三省和枢密院的同堂治事则始终贯彻,在南宋末年编修的《咸淳临安志》中,依然有枢密院“在都堂东,止为枢属列曹之所,盖枢密使率以宰相兼领,故自知院以下皆聚于都堂”的记载。^⑫

(二) 三省主体部分与日常生活空间的紧张关系

在南宋,朝廷并未以都城为标准,对临安实施大规模的改造,更没有像隋唐长安城那样将绝大多数朝廷机关置于皇城内,与民众的生活空间隔开。在临安,朝廷衙署的植入往往是见缝插针地进行,即便三省也是如此,因此在三省主体部分的周围可以看到不少店铺、民居。

《梦粱录》如此记载这一带的早市:

和宁门红杈子前买卖细色异品菜蔬,诸般下饭,及酒醋时新果子,进纳海鲜品件等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气象,殊可人意。孝仁坊口,水晶红白烧酒,曾经宣唤,其味香软,入口便消。六部前丁香馄饨,此味精细尤佳。早市供膳诸色物件甚多,不能尽举。自内后门至观桥下,大街小巷,在在

有之,不论晴雨霜雪皆然也。^⑬“内后门”即宫城北门和宁门,和宁门外热闹非凡,连官人也从早市购买食品,《梦粱录》另有“和宁门外红杈子,早市买卖,市井最盛。盖禁中诸阁分等位,宫娥早晚令黄院子收买食品下饭于此。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遇有宣唤收买,即时供进”的记载,同样让人印象深刻。^⑭孝仁坊是御街以西最靠近和宁门的里坊,提举修内司、御前内辖司西库设在此处,^⑮三省、枢密院、谏院位于孝仁坊的北面。从上面的独立引文可知,御街的早市极其繁荣,连和宁门外都是如此,孝仁坊口、六部前有商贩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地方的晚市同样兴盛:“在孝仁坊红杈子卖早儿膏、澄沙团子、乳糖浇。……庙巷口卖杨梅糖、杏仁膏、薄荷膏、十般膏子糖。内前杈子里卖五色法豆,使五色纸袋儿盛之。”^⑯这里的“庙巷”是保民坊的俗称。^⑰我们甚至能看到有人在三省门外聚众表演的例子:“绍兴中,临安有老道人,年八十余岁,言旧为京城景灵宫道士。尝以冬日在三省门外空地聚众,用湿纸裹黄泥,向日少时即干,已成坚瓦。”^⑱这些都体现了三省与官民日常生活空间紧密乃至紧张的关系。

三省的周围不但有商铺摊位,而且住宅密布。丞相、参知政事、枢密院高层的府第就在三省附近。绍兴二十五年(1155)八月,高宗声称:“向来韩世忠纳宅,当时令移左藏库及仓,欲以仓基造二府以处执政,此祖宗故事。今各散居,非待遇之体。所降旨挥已三年矣,转运司犹未施行,可呼至都堂,传旨催促,并要日近了毕。合用物料、工钱,于御前请降,不得科敷。”^⑲韩世忠于绍兴二十一年去世,其生前得到的两所赐第由其子献于朝廷,分别用于景灵宫的扩建和左藏库的安置。^⑳担任过太府寺丞的郑公显对南宋左藏

库的历史有过记述:“中兴驻蹕临安,草创于和宁门之东北隅,迫隘不足以受天下之灌输。绍兴癸酉,实徙今地,二帑对峙。其东,帑帑繩紬之属在焉;其西,金银泉券丝纆之属在焉。”^㉑“绍兴癸酉”即绍兴二十三年,在此前一年的六月,高宗下诏:“将故韩世忠宅东位地步,见在门廊、屋宇并景灵宫退材,令转运司、修内司同共修盖左藏库南省仓,听逐处指引造作。”^㉒于是,新的左藏库在韩世忠宅第的基址上建造起来,并于绍兴二十三年完成了搬迁。左藏库旧址空出来后,即欲在此地建立执政府,这就是绍兴二十五年高宗所说的“向来韩世忠纳宅,当时令移左藏库及仓,欲以仓基造二府以处执政”的原委。

在左藏库旧址建造执政府的计划,从绍兴二十五年(1155)开始实施,至次年正月,“两浙转运司修盖到执政府三位,诏东位魏良臣,中位沈该,西位汤思退,并令迁入”。同月,高宗又“诏令两浙转运司、修内司将都省北旧府第修盖左、右相府第两位”。^㉓此后,枢密知院府、同知枢密府、签书枢密府也建在丞相府、执政府附近:“左丞相府、右丞相府、枢密知院府、参知政事府、同知枢密府、签书枢密府在太庙北大渠口。绍兴二十六年,诏两浙转运司建三执政府,又即都省北建左、右丞相府,后聚建于今处。”^㉔

三省附近还有不少百姓的住宅。绍兴三年(1133)十二月,殿中侍御史常同提出奏请:“近者有司以遗火延烧之频,乞于执政、侍从之居、仓库四面各毁民居,开留隙地,计所毁无虑数百千家。连日急迫,与延烧无异,民咨胥怨,有害仁政。乞除仓场库务四面量留空地外,其执政、侍从傍近居民,特免毁拆。”对此,高宗“诏执政府第元降空留丈尺指挥减二丈,只空留三丈;侍从官宅不经烧毁去处,并免毁拆,余依已降

① 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7~270页。
② 孙逢吉:《职官纪》卷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15、816页。其中,朝堂位于文德殿门以南:“文德殿门外为朝堂,常以殿前东庑设幕,下置连榻,冬毡夏席,谓之百官幕次。凡朝会必集于此,以待迨班然后入。”见王得臣:《麈史》卷上《朝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页。
③ 吴自牧:《梦粱录》卷九《閤职》,收入《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206页。
④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第3770页;卷三七五《张守节》,第11612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建炎三年四月庚申条,第474~475页。
⑤ 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六卷《宋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3~254页。
⑥ 贾玉英:《唐宋时期中央政治制度变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8页。
⑦ 张祜:《徐渭礼〈淳祐七年十月四日转朝请即告〉释读》,《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75~76页。
⑧⑨ 《咸淳临安志》卷四《朝省》,第3379页。
⑩ 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第850~868页。
⑪ 《宋会要辑稿》仪制五之二四,第2393页。
⑫ 王青松:《南宋中央军事领导体制简论——以两府之间关系变化与运作体制为探讨中心》,《宋史研究论丛》第15辑,2014年,第218~219页。

⑬ 《梦粱录》卷一三《天晓诸人出市》,第242页。
⑭ 《梦粱录》卷八《大内》,第192、193页。
⑮ 《咸淳临安志》卷一〇《内诸司》,第3441页。
⑯ 《梦粱录》卷一三《夜市》,第243页。
⑰ 《咸淳临安志》卷一九《坊巷》,第3546页。
⑱ 洪迈:《夷坚志·支庚》卷八《景灵宫道士》,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99页。
⑲ 《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一九,第9338页。
⑳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〇《衢巷河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1页。
㉑ 《咸淳临安志》卷八《院辖》,第3434页。
㉒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之一九,第9291、9292页。
㉓ 《咸淳临安志》卷一〇《官宇》,第3447页。

指挥”。^①因为临安火灾频发,为了避免大火烧至执政、侍从的居所和仓库,有司意欲拆毁周围成百上千家民居,此举引起了民众的反对,于是常同提议保留执政、侍从住处附近的民居。通过这则事例,可见执政、侍从住宅旁边民居之多。此时执政和侍从都处于散居状态,^②但是至少有一部分人住在三省附近。例如,绍兴三年三月,高宗下诏:“以两浙转运司两廨舍充新除参知政事席益、签书枢密院事徐俯府第,其退下位次却充本司廨宇。”^③此时,两浙转运司在双门北,双门为原先杭州州治的北门:“旧在凤凰山之右,自唐为治所,子城南曰通越门,北曰双门。”^④南宋临安的宫城就是由原来的杭州州治改造而成。由此可见,席益、徐俯的住处搬迁前后始终没有远离三省、枢密院,这也间接证明了这些机构附近民居密集的事实。

三省、枢密院附近店铺、住宅为数甚多,至少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周围人员往来频繁对机构安全的影响。南宋政权对此并非不重视,早在绍兴二年(1132)九月,“初置六部监门一员,以右朝散郎新通判平江府董将为之,秩比寺监丞郎官,有缺得兼”。^⑤与六部监门官不同的是:三省枢密院监门官的设置时间不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如此记述这一职官的简史:“三省、枢密院监门官,旧以小使臣为之。嘉定六年九月,谏官郑景绍言:‘部门以京朝官,则省门事体尤重。’遂亦命京朝官曾经作县、通判资序人为之。”^⑥嘉定六年(1213)任希夷所写的题名记同样略过了三省枢密院监门官的初置时间:“爰自中兴驻蹕临安,三省、枢密院俱列皇城之外,内侍不时至,则参之小使臣,人微官薄,不足以谁何。嘉定六年秋,始用谏大夫议,增置监门官一员,以京朝官宰邑有治理效者为之。”^⑦尽管文献中没有给出确切的时间,这一职

官的设置应该不会很晚。为了确保三省的安全,高宗还在绍兴三年正月下诏:“无故入三省诸门,许人告捕,每名赏钱三十贯。余依见行条法。”^⑧

尽管有上面这些措施,效果却并不理想。绍兴四年(1134)十一月,宰执将监察御史田如鳌的言论进呈给高宗:“朝廷近来未行之事,中外已自喧传,及号令之出,往往悉如众人所料。尝推求其故,皆缘人吏不能谨所致。”对此,高宗表示:“此缘吕颐浩不知大体,虽卖物人亦纵之入政事堂,每每漏泄。”宰相赵鼎说:“前此中书省、枢密院置皇城內,如在天上,何由探知?自渡江,屋宇浅隘,人迹错杂,自然不密。”于是,高宗“命申严法禁,又诏应漏泄边机事务,并行军法,赏钱一千贯,许人告。仍令尚书省出榜”。^⑨通过君臣之间的对话可知,在临安,三省、枢密院建在皇城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安保条件着实不可与北宋相比,再加上此前的宰相吕颐浩管理不严,这给三省、枢密院的日常行政带来不少难题,情报泄露时有发生。吕颐浩两次为相,时间为建炎三年(1129)四月至四年四月、绍兴元年九月至三年九月,^⑩而南宋政权于绍兴二年正月从绍兴府迁至临安府,一直到吕颐浩第二次罢相时仍然停驻于此。前引高宗绍兴三年正月所下的诏书,与吕颐浩任相期间三省管理松懈问题的出现,在时间上究竟孰先孰后,不好下定论,但是这份诏书的效果确实不佳,所以次年君臣对此进行了讨论,不但重申严格执行门禁法令,而且对军事情报的泄露制定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此举效果如何,由于史料失载,我们无法确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与日常生活空间存在紧张关系,三省、枢密院在安保上较之其他朝代面临更大的压力。

三省、枢密院周围店铺、住宅密布的另一不利因素便是火情隐患。前文提到了绍兴三年(1133)朝廷

在执政、侍从住所周围民居的拆迁上让步的事情,这么做是为了平息民众的不满,但是附近住户众多,对朝廷核心机构来说,火灾的威胁始终没有消除,人口的不断增多更是加剧了险情发生的可能性。即便是淳熙五年(1178)后配备了专门的消防官兵,^⑪三省、六部有时也无法在火灾中幸免。嘉泰四年(1204)三月,临安城内发生了一场极其惨烈的火灾,起因是三省附近的民居起火:“行在粮料院后八条巷内、右丞相府大程官刘庆家遗火,自太庙南墙外通衢延烧粮料院及右丞相府、尚书省、枢密院、制敕院、检正房、左右司、谏院、尚书六部,惟存门下后省及工部侍郎厅。次烧万松岭、清平山、仁王寺、石佛庵、枢密院亲兵营、修内司,沿烧至学士院、内酒库及内中宫门廊屋。”^⑫“粮料院巷”是寿域坊的俗称。^⑬大程官只是衙役,而非朝臣,但也住在距离三省不远的寿域坊,侍御史陆峻对这场大火有如此概括:“鬱攸之变,起于民居,三省六部,所存无几,迫及太庙,侵及宫城。”这场火灾波及面非常广,邻近的三省、枢密院和六部均遭受了巨大损失,导致“三省、枢密院及陈丞相家皆寓都亭驿,六部寓传法院”。^⑭都亭驿是接待金朝使者的国宾馆,在候潮门以里。传法院又称为太平兴国传法寺,位于兴礼坊佑圣观一带。^⑮绍定四年(1231)的大火同样烧到了三省、六部:“都城大火,延烧太庙、三省六部、御史台、秘书、玉牒所。”^⑯通过《宋史·理宗纪》“〔绍定四年〕九月丙戌夜,临安火,延及太庙”的记载,^⑰可以知晓此次大火的具体日期。《宋史全文》在记载绍定四年“九月丙戌,临安火”时,提到了宋理宗对此所下的诏书,除了“回禄之灾,延及太庙。祖宗神主暂就御于景灵官”外,还有“令三省、枢密院暂就都亭驿、六部暂就传法寺治事”的举措。^⑱我们无从得知这两次

火灾后三省、六部借用都亭驿、传法院来办公的时间有多长,不过这足以影响到这些机构的日常运作。除了这两次大火外,绍兴二十年正月的火灾也给朝廷核心机构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行都火,燔吏部文书皆尽。”^⑲尽管绍兴二十年、绍定四年的火灾源头不明,但是周围密集的住宅无疑增加了大火延及这些衙署的风险。

三、三省部分机构的散置

在南宋临安,三省抵近宫城的必要性与城市空间状况的紧张关系,不仅表现为其主体部分附近商铺、民居云集,还致使三省的部分下属机构只能在临安的其他地块另辟空间安置,六部架阁库、文思院、军器所、礼部贡院、别试所都属于此种情形。

(一) 六部架阁库

架阁库是收藏文书档案的库房,在南宋,三省枢密院和六部各有架阁库:前者设置于嘉定八年(1215),^⑳“即省闕之中维创以为库”;^㉑后者早在绍兴三年(1133)就已建立,位于都城北部的天水院桥,与六部相距甚远,绍兴十五年又“治其栋宇而新之”。^㉒

六部架阁库未能建在六部内或其周围,六部附近空间有限恐怕是主要原因。周紫芝对初建时期的六部架阁库有所描述:“架阁有屋数十楹,皆依山阜,下即湫隘而为之所。”^㉓与六部架阁库相比,三省枢密院架阁库的规模明显偏小。三省枢密院架阁库起初只有三间,“瓦疏壁瘦,既卑且漏,不足以备充栋之藏”,后来在架阁官蔡更生的极力请求下,才增加到十六间。因为附近机构众多,三省枢密院架阁库在空间上颇为局促:“门内之右为爨室直房,以便细事。外门之

①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八,第9466~9467页。

② 正如前文所说,执政府建立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侍从宅的建置时间则是景定四年(1263),见《咸淳临安志》卷一〇《官宇》,第3447页。

③ 《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一七,第9337页。

④ 《淳祐临安志》卷五《官寺一》,收入《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268、3259页。

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八绍兴二年九月癸亥条,第1005页。

⑥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三《三省监门官》,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28页。

⑦ 《咸淳临安志》卷四《朝省》,第3397页。

⑧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五〇,第2965页。

⑨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八,第8376页。

⑩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二建炎三年四月癸丑条,第470页;卷三二建炎四年四月丙申条,第634页;卷四七绍兴元年九月癸丑条,第847页;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戊午条,第1146页。

⑪ 《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三八,第2644页。

⑫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八嘉泰四年三月丁卯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41~142页。

⑬ 《咸淳临安志》卷一九《坊巷》,第3546页。

⑭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八嘉泰四年三月丁卯条,第142、143页。

⑮ 《咸淳临安志》卷一三《官观》,第3483页;卷七六《寺观二》,第4040页。

⑯ 佚名著,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一绍定四年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5页。

⑰ 《宋史》卷四一《理宗纪一》,第795页。

⑱ 《宋史全文》卷三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668页。

⑲ 《宋史》卷六三《五行志二上》,第1381页。

⑳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四嘉定八年七月庚申条,第271页。

㉑ 《咸淳临安志》卷四《朝省》,第3398页。

㉒ 《咸淳临安志》卷五《六部》,第3405页。

㉓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六一《尚书六部架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33页。

左本库地也,今省府贷以为计簿房,右复借为润圃,皆未敢请复。库之门盖直东出西则吴山,右墙向南为户部度支,左墙枕北当民居之道。”^①看来即便是属于三省枢密院架阁库的土地,也不免遭到其他机构的借占。占地更多的六部架阁库要在六部一带建立起来,显然更加困难。

作为六部的公文库房,架阁库远离六部,对自身职责的履行确有不影响。淳熙二年(1175),周必大针对六部架阁库文书档案管理混乱的现象,提出了整改建议:“委逐部主管,将所置都籍逐一勘,每月赴部书押,令郎官至期躬亲检察,如绍兴之制。仍置一般簿籍,匿藏于长贰厅,以备参考。间遇取索案件,须郎官押帖子下主管官,方许封送,合干人毋得擅启。”^②归纳起来,这些建议的要点有三:一是架阁库每月将簿籍收藏情况报告六部,六部定期派员检查;二是将一部分簿籍置于六部内,以备查阅;三是六部取索簿籍必须严格按照程序办理。很显然,由于架阁库不在六部附近,造成了文书档案保管、使用上的一系列问题。周必大意在通过这些举措,来加强六部郎官对架阁库的监管,并使六部不必为了翻检簿籍而频繁从架阁库调阅。

六部架阁库孤悬在外,除了造成文书档案的管理混乱、使用不便,还使这些簿籍的保管存在安全隐患。淳熙六年(1179),周必大又一次上奏谈论六部架阁库,主要是针对库房的安全问题:“近日轮郎官点检,则所谓屋者,仰视乃与天通,傍观殆无壁落。两月前曾有人舫舟于岸,偷窃吏部案卷敕黄之类,欲载往外州,作故纸出卖。既觉察擒捕,即投弃水中,慢藏海盜,必至于此。”^③在周必大淳熙二年的奏请中,也已提到架阁库“屋宇疏漏,风雨弗蔽”,并请求加以修葺,^④但是并没有引起重视,到了淳熙六年,情况更加糟糕。除了屋宇老化的问题外,因为不在六部周围,架阁库的安保力量明显薄弱,再加上附近水系发达,

故有盗贼将船停靠在岸边,进入架阁库偷窃文书档案,虽然被人捉住,安保上的疏漏可见一斑。对此,周必大除了奏请修缮库屋,还向孝宗提议:“兼六部架阁主管官共四员,自来临安府应副居止,若就库侧兑换麻舍,使其朝夕便于检校,免致疏失,关防之要术也。”^⑤对此,孝宗下诏:“临安府修葺六部架阁库屋,其主管官员居止令就库侧兑换麻舍,使朝夕便于检校,以防文书疏失。”^⑥

对六部架阁库的管理、维护而言,上述措施并非毫无作用,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三省枢密院架阁库文字主管蔡更生的笔下,嘉定年间的六部架阁库依然是“屋室颓漏,上雨旁风,掷弃地间,谁与顾省。鼠噬蛛丝,蒸郁糜溃,不可收拾。吏有绝无才艺,他司弃而不收者,始审名是间,虚沾名俸,而其身未始一到,间有检讨,漫然不知所存。不得已而下取之部,回环曲折,稽缓后时,卒不可得”,这些描写固然是用来反衬其所在的三省枢密院架阁库“高鏐森严,出纳有籍,规式详备,吏不得欺”,^⑦从而突出自己的功绩,不过六部架阁库的状况恐非杜撰。究其实质,孤悬在外的六部架阁库管理不善,处在众多机构包围中的三省枢密院架阁库狭窄局促,都是临安的都城机能与城市空间紧张关系的产物。

(二) 文思院、军器所

在南宋,文思院、军器所的行政隶属关系虽然都有过变化,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归工部统辖。宋朝的文思院建立于太平兴国三年(978),“掌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及凡器服之用,隶少府监”。^⑧建炎三年(1129)四月,南宋政权对寺监进行了大规模并省,少府监的建制撤销,其业务并给工部,^⑨文思院随之转隶于工部。^⑩

文思院在临安市的北部、御街以东不远处,具体

方位为北桥之东。^⑪北桥后来改名为安国桥,位于安国坊内,^⑫可见文思院周围应有不少民居。文思院的地基早先归佛寺所有:“吉祥院在文思院东。乾德三年,光禄大夫、检校睦州刺史薛温舍地建寺。南渡初,斥为文思院、军头司,惟小寺仅存。旧传寺地广袤,最多牡丹,名人巨公皆所游赏。”^⑬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临安市规模不大,再加上既有的空间利用状况,因此可以用来兴建衙署的空地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改变寺院的土地用途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三省主体部分和文思院是这样,军器所也是如此。

相较于文思院,军器所上级机关的变动更为复杂:“旧就军器监置,别差提举官,以内侍领之。绍兴中,改隶工部,罢提举官,日轮工部郎官、军器监官前去本所点验监视;后复以中典领。工部侍郎黄中以言,请复隶属。从之。孝宗即位,有旨增置提点官,以内省都知李焯为之,改称提举,免隶工部。后以御史张震力争,复隶工部。后改隶步军司,寻复旧。”^⑭尽管这一机构的行政隶属关系几经变化,但还是隶属于工部的时间最长。

军器所在临安市的西北部,建于大中祥符寺的旧址上:“大中祥符寺在礼部贡院西。梁大同二年,邑人鲍侃舍宅为寺,旧名发心。唐贞观中,改众善。神龙元年,改中兴。三年,改龙兴。本朝大中祥符初,改赐今额。旧传寺基广袤,九里有奇。南渡初斥为军器所,留西南隅建寺,余地多为民居。”^⑮《梦粱录》中也有类似记载:“大中祥符开元寺广九里,自南渡初,斥西北充军器所、作院及民居。”^⑯元朝士人黄潜祖在追溯大中祥符寺的历史时,也提到了军器所周围的民居:“建炎南渡,金人拥重兵薄城下,城陷寺毁,而地入于官,因斥为御前军器所,民居往往错峙其间,惟存西南

一隅以为寺。”^⑰这些都能证明这一带民众住宅之多。

(三) 礼部贡院、别试所

因为史料失载,我们无从了解周围环境对文思院、军器所造成了哪些影响。幸运的是,距军器所不远的礼部贡院、别试所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在文献中得到了反映。位于观桥西北的礼部贡院建在净住院的旧址上:“净住院在观桥北,后梁宣帝时建,旧名慈光。钱氏改今额。南渡初,以其地为礼部贡院。”^⑱礼部贡院的具体安置时间不详,只知道是绍兴初年所建:“中兴初,诏诸郡贡士类试于各路转运所在州。绍兴五年六月十五日,始集于大宗伯。其贡院建置岁月,未有所考。”^⑲与未曾迁址的礼部贡院不同,用来举行“别头试”的别试所的地点有过变化:“别试所在大理寺之西,旧在贡院右,专以待贡士之避亲嫌者,厥后繇监、漕选皆试于此,湫隘不足以容。淳祐十二年有旨,令临安府别创,乃斥军器所万全指挥营空地为之,其元址并入贡院。”^⑳由此可知,别试所原来地处礼部贡院的西侧,由于内部空间有限,在淳祐十二年(1152)迁至大理寺的西侧,其旧址并入贡院。

之所以将礼部贡院设在观桥西北,恐怕有那里相对宽敞的考虑,毕竟作为科场,礼部贡院需要容纳众多考生。在南宋,受到临安市的城市规模和空间利用状况的限制,官府大多窄隘拥挤。与此相比,礼部贡院已称得上空间开阔,孝宗朝的宰相赵雄就有过“秦桧盖造如贡院、太学、秘书省等,大抵皆宏壮”的感慨。^㉑正因为这样,礼部贡院时常被其他机构借用。例如,乾道三年(1167)南郊亲祭前,太常少卿王淦上奏:“逐次大礼,五使按雅乐、鼓吹、警场并于贡院。前次大礼改用上辛,止就本寺,委是地步窄隘。今来郊祀大礼,五使按雅乐、警场、鼓吹,乞依旧就贡院。”这一请求得到了批准,“自后逐郊仿此”。^㉒又如,乾道九

① 《咸淳临安志》卷四《朝省》,第3398页。

②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三八《论架阁库文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31页。

③⑤ 《文忠集》卷一四三《乞修架阁库》,第567页。

④ 《文忠集》卷一三八《论架阁库文字》,第531页。

⑥ 《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〇,第9339页。

⑦ 《咸淳临安志》卷四《朝省》,第3397~3398页。

⑧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之一,第3781页。

⑨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二建炎三年四月庚申条,第475页。

⑩ 《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第3864页。

⑪ 《乾道临安志》卷一《院》,第3217页;《咸淳临安志》卷八《院籍》,第3433页。

⑫ 《咸淳临安志》卷二一《桥道》,第3558页。

⑬ 《咸淳临安志》卷七六《寺院》,第4043页。

⑭ 《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第3864页。

⑮ 《咸淳临安志》卷七六《寺院》,第4041页。

⑯ 《梦粱录》卷一五《僧塔寺塔》,第259页。

⑰ 《黄潜祖集》卷一五《龙兴祥符戒坛寺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72页。

⑱ 《咸淳临安志》卷七六《寺院》,第4041页。

⑲⑳ 《咸淳临安志》卷一二《贡院》,第3471、3479~3480页。

㉑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一三,第3376页。

㉒ 《中兴礼书》卷四三《郊祀杂录》,《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

年交趾来贡,因为过去用于接待交趾使团的怀远驿早就改作他用,“临安府乞以马军司教场为公舍,得旨照绍兴二十六年怀远驿修除。继而以狭隘闻,礼、工部请以贡院充”,对此孝宗予以认可。^①

礼部贡院的规模虽然不小,但因为考生众多,有时也不见得够用。绍熙三年(1192)六月,礼部侍郎倪思请求将太学招生制度从待补法恢复为混补法。因为此举会导致考生人数增加,他在奏文的最后不得不设法解决考场的设置问题:“契勘向者就补试者至以万计,缘贡院狭窄,若作一场,则不能容,若分作前后场,则必有两次就试之弊。臣窃见近者临安府转运司各建立贡院,若以经义、诗赋分作两处,同日引试,则无向者之患。”^②倪思的提案在朝廷集议时遭到很多人反对,故而未能通过。宁宗登基后,“臣僚上言,议复太学混补,以示初政之优恩。又谓待补之法,行之稍久,冒滥之弊,不可不革”,他们还效仿倪思,提议在礼部贡院之外,启用临安府和两浙转运司的贡院作为考场。对此,宁宗令权吏部尚书、兼侍读、兼直学士院、兼实录院修撰楼钥等人进行商讨。到了庆元元年(1195)四月,楼钥等人提出了实施混补的具体方案,在考场安排上采取如下措施:“礼部贡院通别试所,约容一万五六千人。临安府、转运司两贡院,约可分授万人。今欲以诗赋人尽于礼部贡院引试,经义人临时约度人数,径分两处收试。”^③在别试所搬迁之前,礼部贡院周边没有空地,无法进行扩建,因此在其不敷使用时只能借用包括别试所在的其他考场。

除了规模上的限制外,自然条件、周边环境的缺陷也使礼部贡院的使用多有不便。首先是礼部贡院所在的区域地势低洼,致使贡院异常潮湿。当绍熙三年(1192)朝廷为是否要恢复混补法而进行集议时,持反对态度的吏部尚书赵汝愚等人就有“场屋湫隘,更多蹂践之虞”的担心。^④嘉定十二年(1219)十二月,奉命考校的官员对贡院的条件也有抱怨:“贡院地势卑下,春阳地气上腾,非有板居,恐为湿气所袭。”^⑤

再者,礼部贡院的周围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为考生作弊提供了可乘之机。礼部贡院附近建有不少民居,其中一部分具有一定的商业用途:“诸州士人,自二月间前后到都,各寻安泊待试,遂经部呈验解牒,陈乞纳卷用印,并收买试篮桌椅之类。试日已定,隔宿于贡院前赁房待试,就看坐图。”^⑥这些民居在为考生应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考场秩序的维护造成了隐患。嘉定六年(1213)五月,有臣僚奏请采取措施,解决科场舞弊问题,其中一项便是:

贡院墙壁,本自低矮,年来颓圯,如西边一带,抵靠别试所展华馆,而断垣及肩,践踏成路,传泄之弊,多由此出。最后正通大理寺前,居民搭盖浮屋于墙上,亦作弊处,莫可隄防。东畔墙虽稍高,却与封弥、卷录所相邻,而缝穴最多,关防须密。乞将贡院周围内外墙,并就旧基增筑高阔,里边掘成沟池,阔五六尺许,深浚亦如之。不惟得土筑墙,可省般运,而四傍积水,亦可泄贡院卑湿。墙里加以池,则人不得而逾矣。仍约束居民,不得因墙起造浮屋,庶革传泄之弊。^⑦

众所周知,为了维持科场安全、避免考生舞弊,贡院周围设有荆棘,故而有“棘闱”的别称。然而,南宋临安的礼部贡院地势低洼,围墙低矮且年久失修,附近居民搭建违章建筑,都助长了科场舞弊的可能性。何忠礼指出,北宋礼部贡院的场所多次变化,但是长期寄寓于尚书省,直至北宋末年才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到了南宋,礼部贡院的空间设置最终独立。^⑧在南宋临安,礼部贡院远离尚书省和礼部,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在科举、教育兴盛的背景下,面对临安地狭人稠的空间环境的一种应对之策,却也因此造成了一些管理上的不便。

四、结 语

南宋临安的历史一直深受研究者的重视,并且

已有不少出色的成果。不过,临安的都城职能、空间特性,尤其是两者之间的张力,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对临安历史的片面了解。作为都城必须具备的设施,朝廷衙署在临安既有的空间格局中怎样植入?这一过程对临安的都市空间、朝廷衙署的日后运作造成哪些影响,是事关临安的政治机能如何实现的重大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三省为研究对象,将其放在城市史的视野中加以考察。

与其他朝代相比,南宋三省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分布极其特殊。这里有官僚制度演变的因素,三省和枢密院之所以在同一空间内办公,就与三省界限的淡化、枢密院对三省的依附有一定关系。临安的地形特征、既有的空间利用状况带来的影响则更为关键,这

不仅表现为三省不同寻常地位于宫城以北,还造成了三省的散置,三省与日常生活空间的紧张关系也根源于此。即便是靠近宫城的三省主体部分,周围也是店铺、住宅云集,那些远离三省主体的下属机构同样面临复杂的周围环境,这些机构的管理、运作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作为朝廷核心机构,三省的案例足以说明,在临安这一可利用空间极其有限的城市中,朝廷衙署的植入并非易事,不得不对城市空间有所迁就,在日后也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干扰。另一方面,这些机构的植入,是临安的都城机能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临安的空间结构、都市景观。正是都城机能与城市空间的不断调适,使临安成为帝制时代颇为独特的一个都城。

The Three Departments and the Urban Space of Lin'an in Southern Song China

ZHU Y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dministration buildings are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of a capital city. However, the placement of central government in Lin'an in the Southern Song China was confined by th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space allocation to a great extent. Without exception, the settlement of the Three Departments, which were the core institution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distinctive compared with other dynasties, owing to the position of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scarcity of available space in its neighborhood. While the main part of the Three Departments abnormally located to the north of the imperial palace, some subsidiaries scattered in other areas of Lin'an. Even though the main part of the Three Departments was adjacent to the imperial palace, it was still surrounded by residences, stalls and shops. The subsidiaries mentioned above, far away from the imperial palace, also confronted the complicated surrounding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Three Departments and daily life space in Lin'an was inevitably imposed upon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se institutions.

Key words: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ree Departments; Lin'an; urban space

[责任编辑 陈文彬]

①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一六,第9471页。

② 《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四六,第2757页。

③ 《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四八,第2759页。

④ 《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三,第5376页。

⑤ 《梦粱录》卷二《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第146~147页。

⑥ 《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一三,第5365页。

⑦ 何忠礼:《北宋礼部贡院场所考略》,《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